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妇女生产动员研究

曾晓丽

(天津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84)

【摘要】延安时期,为了打破敌伪的经济封锁,克服政治动员的困境,解放广大妇女,中共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动员广大乡村妇女群众走出家庭,走向生产领域。根据地在动员妇女从事劳动生产时,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思想动员,农户间开展互助合作,树立女性劳动英雄形象等,从而有效地推动了妇女参加生产。在此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问题,如北方农村妇女有不下地的风俗;害怕成为公家人;传统缠足观念制约妇女从事生产;从事动员工作的干部们缺乏动员经验,动员过程中出现组织上的形式主义、工作态度的强迫命令,妇女工作脱离群众,少数干部不能深入群众等。各个根据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应对这些问题。如加强领导,消除妇女的思想顾虑;深入群众中间,解决群众困难;发扬家庭民主,进一步完善生产动员的组织形式;在自愿原则下组织妇女参加纺织变工运动。延安时期的生产动员使广大乡村妇女群众对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开创了一条中国范式的妇女解放道路。

【关键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生产动员;新妇女形象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2)05-0125-11

Research on the Women's Production Mobiliz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Yan'an Period

ZENG Xiao-li

(College of Marxism,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384)

Abstract: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in order to break the economic blockade by the enemy, overcome the dilemma of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nd liberate the majority of housewives, the CCP mobilized the vast numbers of rural women in various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to go out of their families and into the farm work. The CCP had taken a series of measures in various bases to deal with these problems, Various forms of ideological mobilization were carried out; mutual assistance and cooperation among farmers,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female image of labor heroes. As well as effectively promote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roduction. The base areas encountered many problems when mobilizing women to engage in labor production. For example, women in northern rural areas had the custom of not going to the land; they were afraid of working for the government;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footbinding restricts women from engaging in production; the cadres engaged in mobilization work lack mobilization experience, In the mobilization process, there were organizational formalism and forced orders of work attitude; women's work was divorced from the masses, and a small number of cadres cannot go deep among the masses etc. Each base area has taken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deal with these problems, such as strengthening leadership and eliminating women's ideological concerns; Go deep among the masses and solve their difficulties; carry forward family democracy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organizational form of production mobilization; under the principle of voluntariness, women

[收稿日期] 2021-06-16

[基金项目] 天津市教育科学一般规划项目“思想政治理论课讲好‘百年党史故事’路径研究”(CIE210157)

[作者简介] 曾晓丽(1981-),女,法学博士,天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共党史,思想政治教育。

were organiz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change movement. The production mobilization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stimulated women's enthusiasm for production and strongly supported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 mobilization of production among women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war of resistance, and also created a Chinese paradigm for women's liberation.

Key words: Yan'an Perio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duction mobilization; the new women's image

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整风运动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下简称“中共”)对妇女工作进行了调整,于1943年2月26日颁布的《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动员广大农村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生产领域。妇女参加生产劳动,被看做“妇女解放”的重要标志。

生产动员的主要对象是农村妇女群众。动员妇女参加生产不仅是解决革命和战争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也是激发妇女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认同的必要环节。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这一研究,这些研究使人们对妇女参加劳动生产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学者们有对妇女参与纺织生产运动的研究,也有把对传统家庭改造与妇女参加生产连接起来,还有对妇女参加生产与翻身的讨论^①。这些研究深刻揭示了中共从社会生产角度解决妇女解放问题乃至塑造新妇女、新社会的一系列探索。但是,进一步厘清中共采用何种方式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在推进妇女参加生产劳动时,中共遇到哪些独特问题,中共又如何进行调适,总结出哪些经验教训,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中共动员妇女参加生产的复杂过程。本文以抗日根据地的妇女群众为研究对象,基于相关历史文献,尝试探讨延安时期中共如何与妇女建立联系、在动员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过程中遇到哪些困境,中共又如何进行调适,希冀继续推进中共妇运史的研究。

一、动员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缘起

动员广大妇女参加劳动生产,首先是为了打破敌伪的经济封锁,克服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进入1941年以后,由于日本侵略军对华北各根据地连续大规模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与此同时,国民党停发了八路军军饷,对敌后各根据地尤其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禁止输入生产生活的必需品。面对种种经济困难,党中央号召抗日根据地军民更加努力地开展生产运动。晋冀鲁豫根据地经济建设工作会议指出了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重要性:“动员广大妇女走上生产战线(配合放足运动),参加农业劳动和各种副业。因为根据地的劳动力是不足的,据不完全统计,太行区仅去年在战争中死伤和被俘的群众就在七千以上。再加上抗战导致的劳动力短缺,所以补救的办法,就要依靠妇女。”^②因而,动员组织妇女参与纺织与农业生产,成为抗战时期生产运动的重要内容。

其次,为了克服抗战初期政治动员的困境,农村妇女可以形成巨大的力量,但是受妇女教育的限制,广大妇女的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薄弱,需要依靠政治动员启蒙她们的革命意识。基于这种认识,各地进行了有系统的政治动员工作,主要表现在:以“走出家庭”方式的政治启蒙,动员她们走出家庭,积极投身于抗战救国的抗日大潮中。

① 周蕾:《妇女运动新方向的确立——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四三决定”的探讨》,《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董丽敏:《延安经验:从“妇女主义”到“家庭统一战线”——兼论“革命中国”妇女解放理论的生成问题》,《妇女研究论丛》2016年第6期;董丽敏:《组织起来:“新妇女”与“新社会”的构建——以延安时期妇女纺织生产运动为中心的考察》,《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6期;王颖:《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解放(1937—1945)》,《开放时代》2018年第4期;黄锐杰:《“翻身”与“生产”——细读1943年前后边区的妇女“翻身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② 河南省财政厅、河南档案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01),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262页。

通过上述措施,中共希望把“革命话语”植入乡村社会,组织广大妇女投身于革命事业。但是,中共显然高估了普通乡村妇女群众对抗战动员的热情。没有深入的动员,光靠开几个会,讲大道理等宣传形式,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面对政治动员,当地群众反应相当冷淡,有的直接说:“‘年纪大了,念不了了’,‘日本鬼子快打过来了,念书有什么用?’”^①在晋绥临县5区白文镇,当女宣传员采用开会、演戏的形式动员妇女时,发现“良家妇女多不敢外出”^②。由于一些脱离乡村实际的做法,在群众生活困难的1942年前后,妇运处于停顿不前的状态中^③。事实表明,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企图通过政治动员来唤醒乡村妇女的革命意识是非常艰难的。正如有学者所言:“直到1942年,晋西北根据地妇女无论是参政还是参与社会活动,其情形都是十分复杂的。无论是乡村男性成员还是妇女们在行为或意识上都没有走出旧时代的阴影。”^④妇女工作如果不能突破传统的农妇心理,再好的理论也是用不上的。因此,党中央及时调整了动员政策,1943年2月26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强调“妇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达到解放的道路,亦须从经济丰裕与经济独立入手”^⑤。这一政策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充分考虑到了妇女的实际情况和切身利益,将妇女生活的改善看成是能否成功进行政治动员的前提和保障。

再次,是为了解放广大妇女。妇女解放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实践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五四”运动以来,妇女解放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索民族复兴之路的重要内容。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被引入到中国传统社会,中共试图通过改造传统家庭,寻求一条妇女解放的现代道路。在苏区,围绕着妇女解放问题,中共进行了积极的法律构建与实践探索。但是,由于脱离中国乡土社会现实,中共领导的妇女解放引起了不满和混乱。蔡畅指出:“有不少是只知道到处背诵一些‘婚姻自由’、‘经济独立’、‘反对四重压迫’等等口号……致妇女工作不能得到社会舆论的同情,陷于孤立。”^⑥

20世纪40年代,中共注意到家庭在解决妇女问题中的重要性,以发动妇女参加生产为经常工作的中心。妇女参加生产作为这一时期主要的动员内容,不仅是源于抗战的需要,同时对于妇女解放也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早在1940年就指出:“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而边区妇女工作之少成绩,我看主要在没有注意经济方面。”^⑦在毛泽东看来,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一方面可以解决战争所带来的生产劳动力匮乏问题;另一方面,广大妇女走出家庭,冲破旧有的家庭格局,走向解放。朱德也指出,“为什么要动员妇女到生产运动中来?首先是因为:发展边区经济建设,求得自给自足,是边区人民在1941年度的中心任务。其次,妇女要求真正的解放,必须在经济上能够独立生产。”^⑧在朱德看来,所谓以生产工作作为中心,并不等于取消其他方面的工作,而是推动其他方面的工作,继续为妇女争取利益,摆脱妇女所受的封建束缚。妇女参加生产劳动被提升到重要的位置,隐藏着中国共产党从社会生产角度解决妇女解放问题的新探索。

二、中共最初对乡村妇女群众生产动员的方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进入乡村社会,力图通过强有力的措施把“革命话语”植入乡土社会,并

① 戴仲:《怎样办妇女识字班》,《新中华报》1939年4月27日。

② 耿化敏:《中国共产党妇女工作史(1921—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30页。

③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第792页。

④ 王先明,韩振国:《“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调查材料的发现及其价值——档案史料与根据地乡村社会研究》,《安徽史学》2012年第2期。

⑤ 解放日报社论:《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解放日报》1943年2月26日。

⑥ 蔡畅:《迎接妇女工作的新方向》,《解放日报》1943年3月8日。

⑦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第261页。

⑧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第276页。

呼唤广大妇女投身于革命运动,从而解放自身。然而,乡土社会塑造下的乡村妇女无不受着传统的影响,她们渴望生活的改善、地位的提高,但又往往被乡村社会文化与伦理道德所束缚。考虑到上述实际情况,中共决定在各个抗日根据地中采取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推进广大妇女的生产动员工作。

(一)开展形式多样的思想动员

文艺演出能够直观、生动地展现出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场景,对于改变北方乡村妇女不下地的劳动习俗具有积极效果。因此,在蔡畅领导的中央妇委的推动和宣传下,各个敌后根据地纷纷成立剧社团,“积极生产、发家致富以及家庭和睦”都成为抗日根据地农村戏乐活动所要弘扬的主题。村剧团水平不高,但却充满了活力,符合老百姓的口味。比如农民自编自演的《钟万财起家》《二流子变英雄》《刘二起家》等,把原来的二流子人物变成劳动英雄的形象搬上舞台。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根据地妇女参加生产的事例被编成戏曲上台演出。比如陕甘宁边区的《兄妹开荒》,围绕“生产不分男女”的主题展开,演出效果非常好。这些随编随演随唱的新民间戏曲,虽然水平粗糙,而且带有明显的宣传味道,但是演出的内容,都和乡村妇女的生活密切相关。戏曲里边的人物都是出身贫苦的农民,这些节目向妇女们传达的内容是:只要你辛苦劳动,就一样可以成为受人尊敬的人,可以获得荣誉和财富,“劳动”是一切财富和荣誉的真正来源。老百姓爱看,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能够调动农民的情绪,正因为如此,不论是西北的秧歌剧,还是华北的剧团,在动员妇女参加生产的任务中,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除此之外,读报、夜校、识字班、黑板报,也成为生产动员的主要途径。中共西北局指示,宣传部门要在读报工作中普及农业生产与卫生常识、民俗歌谣和小调,推动生产热忱^①。比如,读报是边区群众最普遍的活动,包括一些变工队、扎工队、合作社等民众的经济组织都有读报组,把读报活动搬到田间地头和社会的各个角落。党的生产政策就是通过这样的途径逐渐向广大民众宣传,并且收到了良好的成效。据调查,“凡是有好的读报组和黑板报的地方,那里对政府政策法令和上级号召就容易贯彻,生产教育各项工作就容易开展”^②。

(二)农户间开展互助合作

伴随着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如何把边区140万群众中的几十万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动员组织起来,使他们更有效地投入生产,是更为艰巨复杂的任务,而这正是发展边区经济的基础。毛泽东在论述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确定的经济方针时说:“高级干部会议方针的主要点,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③这成为各个抗日根据地全面推广“劳动互助”的指导思想。

“劳动互助”的提出,旨在缓解农忙季节劳动力和畜力不足的问题。在陕甘宁边区,民间很早就有变工、扎工、唐将班子等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基于互助传统,抗战时期各地发展出变工纺织、纺织互助小组、集体纺织、妇纺合作社、家庭纺织工厂等形式^④。北岳区的定唐县,他们采用了多种拔工形式帮助妇女克服生产困难:一是有技术的和有劳动力的拔工,其中妇女对除苗既不熟练又费力,她会过垄,即和男子换工。妇女不会播种和男子调换,去给他浇园。二是人与牲口的拔工。甲妇女无牲口,乙家有牲口;甲给乙推碾子,腾出牲口去送粪或运销。以后乙家牲口就给甲家送粪或耕地,大秋给乙帮助收秋,秋后乙的牲口给甲耕地种麦。三是青妇与壮老年妇女的拔工,青年妇女喜欢做地里活,壮老年妇女没力气,有耐心做家务琐碎事。她们这样互换工的很多^⑤。由此观之,通过劳动互助,鼓励妇女参加生产劳动

①《广大读者热烈祝贺边区群众报三周年,两月后将改出三日刊》,《解放日报》1943年3月25日。

②《关于发展群众读报办报与通讯工作的决议》(1944年11月16日),《解放日报》1945年1月11日。

③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28页。

④米脂县通讯员集体写作:《米脂妇纺的几种组织形式》,《解放日报》1944年8月4日。

⑤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编辑组:《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中国老年历史研究会出版,1985年,第625页。

是一种比较理想的选择,毕竟这种方式考虑到了广大妇女们参加生产的主客观环境。

(三)塑造女性劳动英雄形象

传统社会,中国农民有“不为富先”的特点,再加上北方妇女有“不下地劳动”的特点,基于此,要动员广大乡村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物质鼓励是必要的,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掀起了向生产中的典型人物学习的浪潮,以此提高妇女的生产积极性。1943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调查历年来农业生产中的劳动英雄予以奖励的命令,指出“调查历年来农业生产中的劳动英雄应予以奖励。”^①其中,赖若愚在地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指出:“如果没有产生一批生产战线上的积极分子,没有一批劳动英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便无从开展,所以积极分子和劳动英雄的培养是一件大事。”^②

此后,各个革命根据地积极塑造女性劳动英雄形象,树立榜样。例如,马杏儿是陕甘宁边区成功塑造的一位劳动英雄,她与父亲早起晚眠,努力生产,极大地改善了原来的生活。1943年“三八”妇女节当天,延安街头遍布“向马杏儿学习”的标语,当“女劳动英雄马杏儿走过街头时,群众热情洋溢地围拢过来,争先同她握手,既表达了大家对劳动英雄的敬意,又反映了人们热爱生产劳动和向英雄学习的决心”^③。又例如,晋察冀边区劳动英雄韩凤龄,和男人一样在地里干活,“在闲歇的时候,她从西家跑到东家!‘她二婶子!把你那地也成起来吧!看样子年成还不会赖呢。’那些还不相信自己的女人们,也都一个个走出来了,走下地去吃力地劳作着,村里的人都说,女人变了”^④。1944年,晋察冀边区号召全边区姐妹向韩凤龄学习。事实证明,在生产中形成以劳动英雄为核心的互助组织,确实起到了一定模范带头作用。据边区建设厅材料,出席劳动英雄大会的荣耀与物质奖励的激励,激发了小生产者的选举热情,部分群众开始争当劳动英雄,甚至出现了妇女与男子劳动竞赛的场景。

三、初期生产动员中的困难与问题

艾森斯塔德指出:“农民通常是最为消极、最无精致目标、最少组织性的阶层,他们很少在政治上变得积极起来,即使在他们表现积极的时候,他们通常也不是仅仅靠自己就能积极起来的。”^⑤中共在乡村进行生产动员初期,并没有想象得那么顺利。中共所面对的是一个不仅在经济上落后、生活上贫困而且思想保守,对生产、政治冷漠的乡村妇女。对乡村妇女生产动员能否顺利进行,一方面取决于动员客体能否在心理上认同中共的政策,另一方面则要考察动员主体是否有实现可行的策略、路径和手段,迅速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

首先,我们分析乡村妇女的情况,在生产动员中,中青年妇女是中共掀起乡村社会变动的骨干和关键性力量。但是,北方地区的特点,农民传统的观念和意识,决定了中共乡村生产动员的艰难性和曲折性。

(一)乡村妇女思想和行为的阻碍

1. 妇女对生产的冷漠

中国共产党所在的根据地大都处于北方的乡土社会。除了土地、血缘和地缘等因素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外,对传统农民的人格和社会心理的塑造起着重要作用的还有礼俗。有学者指出:“礼俗涉及祭祀、婚丧、耕种、岁时、闲暇、家政、教养、宗教和人际交往等各个方面。”^⑥礼俗作为一种温和的手段,规范着人

①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7辑)》,档案出版社,1980年,第78页。

②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七:群众运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20页。

③ 苏平:《蔡畅传》,中国妇女出版社,1990年,第126页。

④ 《新型的妇女—韩凤龄》,《晋察冀日报》,1943年6月27日。

⑤ 艾森斯塔德:《帝国的政治体系》,阎步克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11页。

⑥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57页。

们的行为,从一定程度上讲,礼俗就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传统。历史上在西北、华北等整个北方地区,大多数妇女是不参加生产劳动的,传统上的“男主外,女主内”的风俗盛行。据吕美颐研究:山西省大部分地区妇女从事农业劳动较少,究其原因,一是缠足女性多,不便田间劳作;二是性别比例失调,长时间形成女子不下地劳动的习惯,地处太行山区的武乡县和五台县妇女田场工作量占田场工作总量分别是0.42%和0^①。实际上整个华北地区,受传统观念影响,一些群众对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存在顾虑,“女人不顶事”的旧思想一直存在。有人认为,妇女小脚哪能下田,有的妇女下地干活回家不敢走大路,怕人家笑话。抗战前妇女长期被排斥在社会劳动之外,参加生产劳动被人耻笑。

2. 害怕成为“公家人”

边远乡村的妇女,长期与外界缺乏沟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非常淡漠。在这样的情况下,对能够给农民带来利益的生产运动,广大妇女们一开始表现得非常拒绝,她们害怕成为“公家人”。比如,在陕甘宁边区,发起过成立纺织小组的建议,但因为看不到实际利益,害怕成为公家人,一些会纺织的妇女,也装作不会纺。《解放日报》记载:“1941年5月,南区合作社在南庄河成立了纺织社,以纺一斤赚一斤来号召,宣传妇女纺线,而农村谁也不纺,理由提出的是:‘太笨学不会’,‘没功夫’,‘纺几根线能赚几个钱’,实际上所怕的是:‘学会了要拔去住工厂吧’,‘学会了固定要纺,忙闲都交线,怎么能行’,‘赚几个钱老婆没有了岂不倒霉’。”^②在动员妇女参加妇纺的大会上,经常听到到会的妇女都是你一言我一语地说:“我有娃,不能纺的。我在家做饭做针线,顾不上纺。”事实上,一些会纺的妇女装作不会纺,实际上是对“公家”以及“公家人”的防范。妇女们的顾虑在于“给公家纺了线,就变成公家人了,以后就是咱们的差使了,不论咱有空没空,以后就不能不纺了。”^③在淮北推广纺织运动时,谣言四起,有人说:“不要学纺,学会新四军就要带走了。学会纺,就到新四军工厂去纺,不能回家了。”^④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广大农村妇女适应着“男主外,女主内”传统的道德规范,在这样的男女合力协作的生产方式中,经营着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她们对“公”的认识是不足的,对革命中的“公家”是抵触的。

3. “小脚”的身体限制

深植于北方乡土风俗中的“缠足观念”,已内化为妇女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小脚成为决定妇女婚嫁的重要标准。20世纪30—40年代开始,中共虽然积极推动放足运动,但是基于交通阻隔,大多数乡村妇女固守旧规,缠足习俗依然较盛。1930—1940年代华北区域的女性缠足状况,处于一个挣脱传统束缚的转型期,城镇快于乡村,临近城镇乡村快于偏远乡村^⑤。1942年张闻天在陕西省神府县进行调查时发现,在当地8个自然村中,“这里二十岁以下的妇女,大都天足。三十岁左右的‘改组派’(即半放足)居多。三、四十岁以上的都是三寸金莲的小脚”^⑥。事实上,小脚不仅影响妇女们的身心健康,也影响从事生产。《新华日报》发表文章谈论小脚对生产的影响:“武涉等七八岁女孩仍是‘辣椒脚’,这对于妇女参加春耕增加了很多困难。”^⑦有农妇说:“在地里干活可苦了,都是一点点的小脚,走都走不好,别说干活了。像割麦子吧,都是割两把,立霎(立刻)按住镰刀,跷起脚歇歇,再重割。”^⑧缠足,没有受教育权利,生活空

① 吕美颐:《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妇女状况的历史考察》,《妇女研究论丛》1996年第1期。

② 赵烽:《延安县柳林区二乡的妇女生产》,《解放日报》1943年3月8日。

③ 莫艾:《一页妇纺发展史》,《解放日报》1943年2月28日。

④ 《淮北纺织运动的总结》(1944.7),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5辑),安徽省档案馆,1985年,第181页。

⑤ 江沛、王微:《“三寸金莲”之变:华北中共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与女性身体》,《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⑥ 张闻天选集传记组、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74页。

⑦ 《动员广大妇女群众参加生产》,《新华日报》1942年3月31日。

⑧ 李小江:《让女人自己说话:独立的历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312—313页。

间狭小,长期被禁锢在传统的家庭角色中,洗衣做饭、碾米磨面、料理家务几乎是妇女们生活的全部。

(二) 妇女干部在动员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 组织上的形式主义和工作方式上的强迫命令

尽管中共中央强调对广大乡村妇女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动员,然而部分妇女干部工作能力和动员方法不足,在实际工作中倾向于用行政命令、强迫的方法来完成工作。比如,经中共组织的动员,各乡村都成立了妇救会组织,下设妇女生产小组,努力动员女性参加政治工作与生产劳动。然而,动员妇女绝非易事,情况较为复杂,很多生产小组形同虚设,生产动员工作流于形式。浦安修在《五年来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妇女运动的初步总结》中指出:“动员妇女参加农业生产(主要劳动),在许多地区成立了生产小组、互助组,但多属形式空洞的组织,强调妇女单独地集体耕种,只有少数妇女参加这种生产劳动,而且妇女脱离家庭参加农业生产,并没有改善妇女的生活及地位,相反地,促进了家庭对妇女及妇救会的不满。”^①张闻天在晋西北调查中发现:“大多数村并无妇女小组。贺家川虽有,实为村政权下的妇女组织,同妇联会没有关系。”^②这种组织上的形式主义,使得大多数妇女还没有真正组织起来,并没有使妇女组织建立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之上,已经组织起来的基础还非常薄弱,经常是流动性的。事实上,动员妇女参加劳动生产需要耐心地说服教育,更需要认真细致地工作,如果说只是流于形式主义,简单采取强制命令的做法无法让妇女们抛开传统,积极热情地参加劳动生产。

2. 妇女工作脱离群众,少数干部不能深入群众

1940年初,妇联虽提出过发动妇女参加生产,但是对于基层干部来说,把妇女参加生产作为便于组织团结妇女的方法而去搞生产,动员只是宣传,制度不健全;有的地方不顾妇女生活的改善问题,也不看地方条件,出现一些基层干部脱离群众的现象。比如,在生产动员初期,“组织突击开荒,路途遥远使农民开荒时耽误耕种自家土地,摊派更影响了农民的劳动热情”^③。中共北方分局妇委书记田秀涓在总结《1943年前晋察冀农村妇女工作的初步估计》中指出:“特别是后两年在上层领导上,不根据下层群众的需要,不注意想实际办法,伸手要成绩,要数目字,要调查材料。浪费人力物力。总之,我们是为‘上级’、为‘任务’的观点,为‘群众’的观点则异常欠缺。”^④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地区偏于一般口号,没有很好地帮助群众解决具体困难,因此,或者只是听到喊,没有动,或者刚刚动起来,就受到棉花及技术限制,不幸夭折。还有些地方,在领导上一开始就只注意发展了多少妇纺,而忽视技术上的指导。有些地方,对于动员妇女参加生产的工作,采取一种自流现象,不从群众要求出发,只看到解决问题比较困难。习仲勋在延安“三八”妇女节纪念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了少数基层干部在组织动员妇女参加生产时表现出来的一些问题:“有些同志,说我们已经号召了妇女起来参加生产,我们选出了劳动英雄,还开了会,给戴了花朵,并且给了奖,又组织了妇纺小组等等,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呢?我们有的同志似乎有这样的脾气,只喜欢大叫大喊,不怎么高兴细针细线,号召是要的,但那不过是事情的开头,接下去就是要具体组织,或者叫具体领导。”^⑤之所以出现脱离群众现象,除了一些基层干部没有经验外,不能深入群众细致地开展工作是重要原因。

① 浦安修:《五年来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妇女运动的初步总结》,《党的生活》1943年7月16日。

② 张闻天选集传记组、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92页。

③ 鲁直:《对“集体”开荒的意见》,《解放日报》1942年5月9日。

④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北岳抗日根据地(1937.7—1944.9)》(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786页。

⑤ 《贯彻边区妇运的正确方针》(习仲勋在延安“三八”妇女节纪念会上的讲话),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1—72页。

四、党领导下的妇女生产动员工作的调适

动员妇女参加生产中出现的种种困难和问题,说明妇女与革命的互动关系并非单一的对接模式。中共的生产政策与农村妇女传统伦理秩序、日常经济生活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为了激发广大妇女生产热情,使生产动员不流于形式,根据地加强领导,完善制度,以促使生产深入人心。

(一)加强领导,消除妇女的思想顾虑

如上文所述,各地的生产动员工作搞得粗糙,没有深入动员。如果不能把生产运动转变成真正的群众运动,就不能迅速解除妇女的思想顾虑而积极地参加生产。基于生产动员中存在的问题,“四三”决定颁布后,本着妇女工作要从农村实际出发的精神,广大妇女干部深入乡村,一改以往的宣传风格。妇女干部带头参加生产,需要一定的条件和工作方法。自己不懂得生产知识,不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是不行的。中共北方分局妇委书记田秀涓指出:“领导干部更需要深入农村家庭,学会组织群众家务,组织妇女劳动力,掌握生产技术,并加强与各界联系,学习社会知识,解决妇女生产工具、原料、销路、技术诸问题,以便领导群众生产。”^①在冀鲁豫边区,为了发动农民迅速转入生产运动中,高元贵指出:“在生产运动中,我们也要坚决反对包办代替,要相信群众力量,把生产运动形成真正群众自己的运动。在生产运动中,也要站在群众之中,不要站在群众之上或群众之外。这就要求我们干部亲自参加生产,与群众共同去生产,并从群众现有生产经验出发,在解决实际问题中,一步一步的提高群众。”^②

由此可见,中共中央要求领导妇女干部必须在思想上行动上树立以群众为中心的观点,加强对乡村妇女生产运动的领导。各级妇女干部亲临生产第一线,带头生产劳动,在政治经济活动中她们既是领导者,又是参加者。中央妇委书记蔡畅不但号召妇女干部和妇女群众参加生产,自己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她“带头参加了生产劳动,开荒种菜,纺纱编织……在她住的窑洞里,和办公桌并排放着一架纺车,忙一阵工作,就坐在纺车旁去纺一阵线”^③。

广大妇女干部深入乡村,与乡村妇女建立紧密的联系,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如陕甘宁边区陈家楼子纺织合作社,在合作社的领导下,群众自愿原则下开展起来的家庭纺织业,形成以下特点:(1)办合作社,调剂供销,传习技术,分散纺织。陈家楼子原来只有两个纺妇、两个织妇,五架纺车、一架织机,大家要纺织,就要棉花纺车织机,就要传习技术,为解决这个问题,群众自动集股办合作社。每股包谷五升,开始集了三〇九股,后来发展到一〇三四股,每股一斗包谷,用这些股金,先后买进了七九二斤棉花,三十架纺车,十四架织机,用买卖方式或借贷方式给群众使用,群众各自在家庭纺织。有些自纺自织自穿,有些到合作社领花纺纱,领纱织布,挣工钱补助生活。对于不会纺不会织的人,合作社组织小组,由会纺会织的人当组长,负责教育,现在全村已有五十位纺妇,其中十二个能织的。(2)照顾纺织妇及双方利益,对纺织妇给付合理的工资外,尚有各种优待办法及奖励办法,例如经常廉价卖给棉花,纺织到一定数量,合作社给予奖励股和照本售卖纺织妇全家穿用的布匹等,保证社员获得一定的红利^④。

陈家楼子纺织合作社之所以受欢迎,在于建立和健全合作社的领导机构,加强对合作社的领导,领导干部能够真正地深入群众中去,以替群众解决穿衣问题出发,对消除妇女纺织顾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有利于推动妇女参加生产。

①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第805页。

②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60页。

③ 苏平:《蔡畅年谱》,中国妇女出版社,1990年,第126页。

④ 《陕甘宁边区民间纺织业》(1946.3),陕西省妇联:《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文献资料》(续集),1985年,内部资料,第401—402页。

(二)深入妇女中间,解决群众困难

过去领导妇女运动的干部认为自己是公家人,是工作人员,缺乏对底层妇女的了解,致使妇女工作不能深入开展。为了避免出现形式主义或者自流现象,中共多次强必须在思想确立群众观点。高岗指出:“过去的妇女组织是有许多形式主义的,许多组织都没有实际工作内容。原因就是她们不会利用合作社、变工队、妇纺小组等各种形式去进行工作,她们不知这种形式是群众自己的形式,是符合群众利益的一种形式。仍然是主观主义的一套,不与群众的生产组织联系,所以她们的工作,老是做不出很大的成绩来,他们的组织,老是没有内容的空架子。今后的妇女工作形式,应该是利用群众生产中的各种各样的新形式,去代替没有内容的旧形式。而它的工作内容,则应该把重心放在组织领导群众生产上,使群众的小米、牛、羊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使群众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那我们的妇女水平,也就一天比一天提高起来了。”^①针对生产动员过程中不重视群众的情况,各个敌后根据地不断完善动员过程中的具体办法,一切都要与群众利益结合起来,处处顾及群众利益:1.开展群众性纺织运动,无论在产棉区,非产棉区,内地区与游击区,都大量开展纺织。2.开展纺织训练班,轮流训练妇女,解决技术和工具问题。如安徽马坝区的民众纺织厂,会同区农抗召集全区木工研究改良纺车方法,由政府贷款经木工制造,解决了全区纺车问题。对买不起纺车的,则准先领车领花,然后以工资还价。马坝、旧铺、古城等地纺织训练班均已开始,有许多人学了七天就能纺纱。其中旧铺区的训练班,系以乡为单位,每乡选一个中心村,由外来专家教授,各村则向这中心村学习,造成普遍的学习纺纱空气^②。3.针对开展纺织运动中有些地方重量不重质的现象,提出精纺精织,提高质量的口号。4.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号召群众向她们看齐。陕甘宁边区的探索首先是寻找会纺织的普通劳动妇女,并且以此为突破口,培养积极分子。如“延安南区,刘主任计划发展妇纺,他随时在打听哪里会有会纺纱的妇女。适值给他们修工厂房子的石匠李国泰的老婆就会纺纱,就是没有棉花和车子。刘主任听到这个话,就做了车子,拿了棉花送给李国泰老婆去纺。并对她说,只要你会纺不管线子纺得好坏,合作社都要,并且还要奖赏你,这时李国泰老婆就开始纺线了。在第一次交线的时候,刘主任奖了她九元钱,因此,李国泰老婆纺线的积极性就提起来了。以后她又领了棉花回去,见庄里的妇女,就滔滔不绝地夸奖刘主任奖赏了她。因而南和庄从前本来会纺而装作不会纺的王世业、王国义、张庆福等的老婆,听了都开始纺上了。刘主任觉得鼓励的方法很好,他后来又给李国泰老婆奖励了二百元,此时正是换冬衣的时候,她用来买了芝麻呢土布,缝了一身棉衣给李国泰穿上。李国泰又是个石匠,经常出门在外做工,生性又好说话,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这样一宣传,全二乡的男女,大家眼红了,于是纷纷去工厂里领棉花学纺,到十月间就发展到八九十个妇纺了。”^③李国泰的妻子积极参与纺织,成功脱贫致富的经验引发了极大示范效应,消除了当地民众对于“妇纺”的疑虑,纷纷效仿,作为生产运动之一的“妇纺”打开了工作局面。在淮北,动员地方上思想积极的妇女学纺纱,一般时间是十天到两周,课程内三分政治课,七分纺纱课。培训好以后,每人带回去一辆纺车、二斤棉花,然后到本乡本村去教别人。她们回去以后,一面自纺给群众看,一面教她们。群众中“纺纱不能回家了,新四军带去了!”等谣言已被打破,大家愿意来学^④。5.根据各地具体情形与群众经验,订立兴家计划。比如,1943年,延安推行农户计划,以家庭为单位,县乡区干部深入基层,根据农户的经济条件和要求,帮助农户制订增产计划。关于农户计划的问题,要求“无论干部党员,在订计划的时候,对于群众

①《从生产战线上开展妇女运动》(1944.3),陕西省妇联:《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文献资料》(续集),1985年,内部资料,第350页。

②《淮南路东开展群众纺织运动》,(1944.2),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一),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0页。

③鲁直:《延安南区发展妇纺的经验》,《解放日报》1943年3月28日。

④《淮北纺织运动的总结》(1944.7),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5辑),内部资料,1985年,第195页。

要有诚恳和蔼的态度,使他很亲近你,觉得你真正替他自己做事,愿意把他家的情况一一的向你告诉、倾听你给他自家的意见”^①。边区政府还鼓励干部入户宣传农户计划的时候,“宣传方式要反对训话、报告、讲演、官僚式的宣传……应采用漫谈问讨的方式宣传,这样群众不觉你与他隔得远,做宣传工作的人应善于发现农民的困难问题”^②。

(三)发扬民主,进一步完善生产动员的组织形式

传统社会,男性家长拥有绝对权力,女性被限制在家庭内部活动,没有机会参与公共事务。为了提高妇女参加生产的积极性,根据地主张采取发扬家庭民主的办法,使妇女在家庭里获得平等地位,以便可以参与公共事务。太行区妇委在《妇女工作初步研究》中指出:“要使全家的生产情绪高,必须开展家庭民主,提倡家庭和睦。妇女必须以家庭一员的姿态,来担任生产任务,生产所得,交给家庭。为了奖励妇女生产,又须适当分红,家长须在一定期间,给大家宣布家庭的收支……家庭中的纠纷,一般应经过家庭会议来解决,而家庭会议,也须发扬民主。”^③罗琼在《陕甘宁边区民间纺织业》总结了提高妇女参加生产积极性的经验,指出:“根据此次群英会中七位女劳动英雄的境遇看来,其中两位是抗属,两位是寡妇,两位的丈夫是懦弱无能的人,还有两位的丈夫是二流子。因此,这七位女劳动英雄都肩负着家庭生活的重担,要用自己的劳动获取生活必需品。同时,她们自己又有权支配自己的生产成果。再从安寨东沟郝起荣的家庭纺织来看,全家四个妇女纺织。过去由郝母管理生产,分配布匹,三个媳妇都觉得自己纺织得多,分得少,生产不积极。一九四二年,郝起荣召集家庭会议,宣布谁纺得多,织得多,谁就穿得多,结果大家抢着纺织。全年织小布七十五丈,超过四一年的两倍,四三年依旧采取这办法,全家织布八十一丈,大家有穿有用,还靠纺织挣了钱,建立了家务。从这两件事实中,很明显的可以看出,只有发扬家庭民主,提倡男女共建家业,发动妇女们参加生产,同时又要有权支配一部分生产成果,那么生产积极性才能提高。”^④

陕甘宁边区为了有效动员妇女参加生产,采取了召开家庭会议的办法。在实际工作中,首先由农户召集家庭会议,通过创造家庭的民主氛围讨论订出计划。召开家庭会议,发扬家庭民主,改变往日家长一言堂的旧的习惯,通过农户计划的订立和家庭会议的召开,“才能把全家劳动力尤其是妇女儿童都组织起来,才能把全家人的生产积极性激发起来,把家庭计划看作是自己个人的计划去贯彻实现”^⑤。事实上,通过召开家庭民主会议,全家人提出提高生产的明确目标,妇女们下地干活也很起劲,全家生活得到改善。根据地的家庭生产呈现出新的面貌:“从上到下,从人力到物力,从生产到消费,都‘组织起来了’,……就达到了家庭和睦,经济繁荣,互助精神高涨,而且影响了别人。”^⑥

(四)在自愿原则下组织妇女参加纺织变工运动

在参加纺织生产的过程中,妇女们通常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纺织工具不好用影响精纺精织,影响精纺精织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纺、织、用没有紧密结合起来^⑦。为了解决妇女在生产中遇到的问题,组织妇女纺织变工,成为各根据地的基本办法。1944年2月,中共晋绥分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开展大规模生产运动的指示》,指示要求扩大变工组织,把全边区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劳动力,在自愿的原则下,组

① 张邦英:《关于农户计划的问题》,《解放日报》1943年5月9日。

② 黄静波:《做农户计划的一些经验》,《解放日报》1943年6月10日。

③ 《妇女工作初步研究》(1945年10月),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七:群众运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37页。

④ 《陕甘宁边区民间纺织业》(1946年3月),陕西省妇联:《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文献资料》(续集),1985年,内部资料,第405-406页。

⑤ 晋察冀日报社论:《户计划与家庭会议》,《晋察冀日报》1945年3月16日。

⑥ 《解放日报》编辑部:《发扬根据地新式家庭》,《解放日报》1944年8月25日。

⑦ 晋绥边区行政公署:《一年来的妇女纺织运动及其经验教训》,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出版,第9页。

织到各种各样的变工互助组织之内。在妇女纺织方面,要组织纺织变工,把纺织变工当作变工互助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发展纺织参加纺织变工,当作男女老少大家的事,而不是妇女的事^①。

晋绥边区根据一年来纺织工作中存在的种种不足,提出了组织妇女参加纺织变工。变工形式多样,如马改果的变工互助组织形式,从农业变工到日常生活一切事情的变工。“她是在人少地多,缺乏牛力,把妇女组织起来,她是把妇女劳动力组织起来发挥所有的力量,由于变工省了工,发展了纺织。”^②根据群众实际需要组织变工,可以节省劳力,在互助中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使生产顺利开展。

总之,广大妇女干部深入乡村,依靠群众,运用一切方法解决她们的生产困难,这是中共根据各根据地的实际情况调整的结果。实际工作中,这些妇女干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在危难之际,社会动员能否成功,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她们所代表的“党的形象”。正如欧文·拉铁摩尔为《中国震撼世界》所做序言里谈到:“中国的芸芸众生,他们正在寻找一个他们觉得能够代表他们,为他们谋利益的领导,他们将衷心拥护这样的领导。他们经过年复一年的寻找,坚信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领导,并为此而欢欣鼓舞。”^③

综上所述,传统社会,北方妇女不下地现象十分普遍。抗战时期,为了战胜经济困难,解放妇女,中共在各个抗日根据地进行生产动员。然而,要改变传统风俗并非易事,需要进行艰苦细致的动员。动员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过程中,也存在着种种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在党的领导下对生产动员工作进行调适,有效解决了问题,提高了广大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积极性。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在各个根据地动员乡村妇女参加劳动生产,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使乡村妇女群众的生活观念、思想观念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她们走出家庭,走向田间、走向社会、走向战场,向世人展示了“妇女可以顶半边天”的新形象。动员妇女参加生产,不仅可以解决因战争带来的劳动力短缺,也是应对经济危机的现实需要。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乡村妇女都被动员起来,融入大生产运动的潮流中,为抗日战争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由于她们积极参加劳动生产,认识到“劳动”才是一切财富和荣誉的真正来源,切实扫荡着传统观念,对“公家”有了全新的认识。对于广大乡村妇女群众来说,“集体劳动”使得“公”与“私”不再成为简单对立的范畴,而“公家事”也不再被视为负担而被排斥在外,对政治冷漠的乡村妇女渐渐有了“公”的概念。动员广大乡村妇女从事生产,从走出家庭到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相结合,抗战动员,妇女解放启蒙与家庭利益兼顾,劳动成为建设新家庭,塑造革命新人和再造新社会的中介。

动员妇女参加劳动生产,既是共产党坚持抗战的重要举措,实现了乡村的革命动员,也是改造妇女,实现妇女解放的重要尝试。寄寓着中共通过重新处理妇女与革命的关系来摸索一种不同于发达国家“妇女解放”的新理想和路径。更为重要的是,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妇女参加生产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毛泽东所提出的妇女解放理论,“教育子女,鼓励丈夫,教育群众,均需要通过妇女;只有妇女都动员起来,全中国人民也必然会动员起来了”^④,所以,“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⑤。可以说,在毛泽东的视野中,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十分重要。妇女在支前、参战、生产中的作用,不仅体现了妇女对抗战的重大贡献,而且指明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妇女解放道路,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参加社会生产是妇女解放的首要条件”原理,又开创了一条“不以男子为对立面”的、主张将妇女解放与男女平等与民族解放有机结合的、中国范式的妇女解放道路。(责任编辑:李良木)

①《中共晋绥分局关于进一步开展大规模生产运动的指示》(1944.2),中共吕梁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晋绥根据地资料选编》(第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4页。

②晋绥边区行政公署:《一年来的妇女纺织运动及其经验教训》,第17页。

③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邱应觉等译,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3页。

④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第149页。

⑤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第150页。